

章玉政·编著

刘文典年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刘文典年谱

章玉政·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文典年谱 / 章玉政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64-0307-0

I. ①刘… II. ①章… III. ①刘文典(1889~1958)
—年谱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330 号

刘文典年谱

章玉政 编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28

字数: 378千字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00元

ISBN 978-7-5664-0307-0

责任编辑:程中业

装帧设计:陈耀

责任印制: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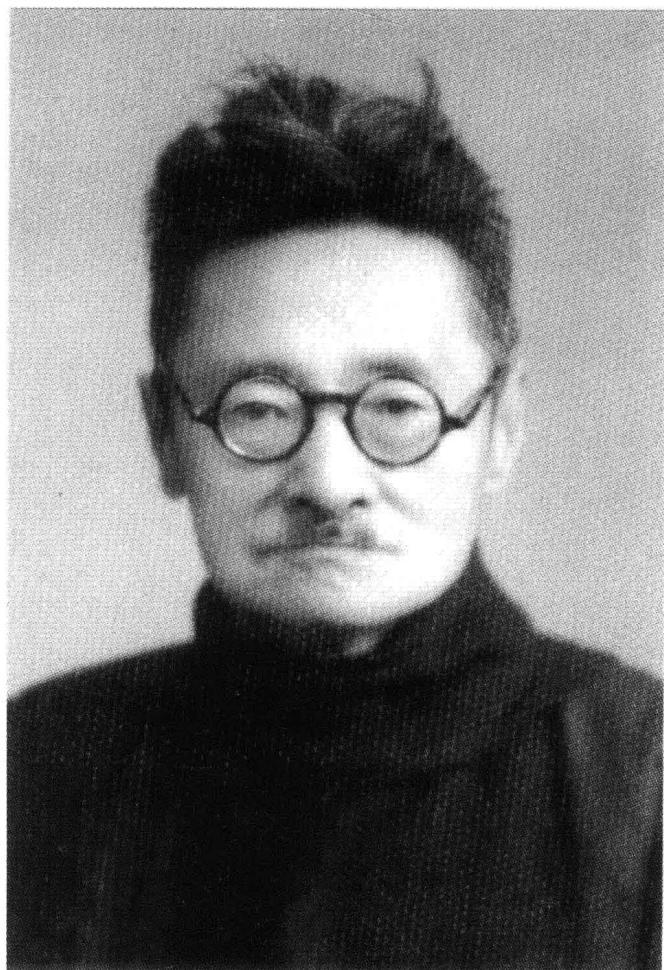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5106311



刘文典



刘文典画像 李鹏/绘

君子曰學不可已
青取土於藍而
出而寒於水故
木受繩則直金
就礪則利君子博
學而日參省乎已則
知明而行無過矣

書贈

安大旅京諸同學

文典



刘文典为《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题词,1934年2月

凡例

一、本谱以时间为主线，共分八卷。卷一至卷七述谱主出生至逝世之事迹，卷八述谱主逝后之事。

二、本谱各年以公元纪年冠首，附注干支纪年，且民国前附记清代年号，民国后附记民国年份（至1949年）。

三、本谱正文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系旬或月。无旬、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谱主年岁以周年计。

四、本谱对谱主一律称“先生”。对所涉及其他人物，一律径称其名。

五、先生著述多有修改者，均按《刘文典全集》、《刘文典全集补编》定稿收入本谱。先生部分文章初稿具备文献价值者，则于条文中分述。

六、本谱所收先生著述、书信等，均注明出处。部分文字根据原件整理，或无法辨识，或本就阙疑，均以“口”代替。引用文字，原有“口”者，一律照旧。

七、本谱所引谱主文字，凡《刘文典全集》、《刘文典全集补编》中已收入者，均从略。凡未收入两书者，则从详。

八、本谱所引资料,多依据第一手来源。部分无法查核第一手来源者,则尽量采用权威转述。部分文、图来源网络,已在文中注明。

九、凡文献注释,第一次出现时,注作者名、书名(篇名)、页码、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及版次,以下只注作者名、书名(篇名)和页码。

导言

刘文典镜像

——从“五四”学人看中国近现代社会

历史的许多场景，总是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来北京之前，偶然看到易中天《品三国》里的一个说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 27 岁，诸葛亮 27 岁，周瑜 34 岁，鲁肃 37 岁，刘备 47 岁，曹操 54 岁。孙刘联军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 34 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有人说，赤壁之战是年轻人打败了老年人，是新生力量打败了传统势力。

这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和场景是多么的不谋而合！“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三峡”（唐德刚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非常有意思的是，运动的鼓吹者、领导者和参与者们当时都很年轻，整个一帮“小字号”：陈独秀 40 岁，胡适 28 岁，罗家伦 22 岁，傅斯年 23 岁。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刘文典，也只有 28 岁。

所以说，年轻是一种力量。无论后来的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意义作出了如何不同的评价与阐释，有一点却是共识：这股由年轻力量推动起来的时代风潮，直接改变了当时的中国，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五四”话题为何依然炽热？

时隔 90 年，“五四”依然是个热门话题。

别的不说，但就图书出版而言，今年（2008 年）就有一批关于“五四”的新书上市，或是新作，或是再版，或是翻印，如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杨亮功的《五四》等，安徽的黄山书社干脆翻印了一套“西化—现代化”丛书，包括张君勱的《科学与人生观》、吴虞的《吴虞文录》、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等。

“五四”话题为何依然这么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往往喜欢从政治价值的层面去解读“五四”运动，对其最常见的评价就是“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可能并非唯一的答案。我想，人们至今热衷于“五四”话题的讨论，更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另一方面：它还是一场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思想革命。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有一个渐进孕育的过程。远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梁启超、谭嗣同那里；近的思想根源，则来自于“新青年群”，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刘文典等人。

“新青年群”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推动者。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起点，“新青年群”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从批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入手，主张中国文化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并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样本来重估国人过去的思想行为。正如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所言，“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

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群”，本质上是一群“纯粹的近

代知识分子”(李泽厚语),他们之所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时代背景大有关联。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以刘文典为例。我在《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一书中已经写明,他是《新青年》首批作者群里的重要成员。

刘文典与胡适同为北大“卯字号名人”,均属兔,生于1891年。这一年,尽管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晚清政府日渐衰微,备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致使民众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仅当年就发生了“扬州教案”、“芜湖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等群体性事件。作为较早的觉悟者和先驱者,知识分子们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与尝试。这一年的8月,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正式设立学堂,开门讲学,并刊行《新学伪经考》一书,试图走改良道路来救中国。

历史风云的巨变,已是“蓄谋”已久、喷薄待发。处在这样的新旧转型时期,刘文典从小就接受两种文化形态的熏陶: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种是来自异域的西方文化。由于父辈的开明,他可以一边在私塾学校读古书,一边跟在美国传教士后面学外语和生物学。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西洋文化接触,“这时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

当然,占据刘文典内心世界主要阵地的依然是当时盛行的“扶清灭洋”思想。1905年,刘文典进入芜湖的安徽公学读书。这所学校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李光炯创办,所聘请的教员不少是怀有革命宣教目的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刘师培等。陈独秀发起了反清团体“岳王会”,刘文典可能就是其早期成员之一,后来这个组织基本上“整体划转”进同盟会。刘师培更生猛,尽管他教的是《说文解字》和《昭明文选》,却一个劲地向学生灌输反清思想。据说,他评定学生成绩有个规定,“凡讲排满的都另加几十分,不讲的扣几十分”。因而这时候的

刘文典，只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直到后来去了日本留学，刘文典才开始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新学”。在别人的指点下，他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海克尔（今译赫凯尔）的《宇宙之谜》和《生命之不可思议》。他毫不讳言自身受到了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

刘文典的这种留学经历和阅读体验很有意思，并且颇具代表性。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领导者和参与者，均有留学背景，如陈独秀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等。而更多人则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诸如进化论、人权说等西方思想的浸染，如鲁迅就是进化论的早期鼓吹者之一。

从1915年11月《新青年》的第一卷第三期起，刘文典就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第一篇由他翻译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名作。紧接着，刘文典又翻译或撰写了《叔本华自我意志说》、《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等一批颇有分量的文章。同时，他还直接参与了“新青年群”与玄学派的论战，批评当时甚嚣尘上的“灵学”，横扫妖雾，其观点被认为“上升到了严格的哲学层次”。

刘文典与“新青年群”的努力，被当时学界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反叛”，其启蒙价值不言而喻。在他们的“凯歌高奏”声中，偶像被打倒，传统被撕裂，经典被重读，权威被冲击，这无疑为后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其实，“五四”知识人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未必都是正确的，有的确实有些极端甚至是错谬的，因而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论战，如“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等等。大家吵得不亦乐乎，各不相让，似乎也没有得出什么标准答案。但思想启蒙这东西正应如此：在纷繁复杂的论争和多种声音

的交汇中，相互碰撞，求同存异，坚持批判的精神，尊重个体的力量，不断向前，直至找到新的方向。我觉得，思想多元、允许争论是“五四”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之一。

1957年5月，刘文典写过一篇《忆五四》，说：“中国人之接受新思想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的。”此言不虚。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斗转星移，“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从此元气大伤，一蹶难振。

去年（2007年）发生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今年被频频提及的“普适价值”一词，都再一次告诉我们：“五四”所要走的道路并未走完，特别是思想启蒙之路。这可能正是人们至今依然深切怀念“五四”的根本原因。

国学大师为何渐行渐远？

今天我们谈“五四”，谈刘文典，谈那一代人，似乎都不能回避一个话题：真正的大师已经越来越少。

如今“大师”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前几年，季羨林先生三辞“桂冠”，其中一个就是“国学大师”。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回望“五四”时代乃至整个民国时代，你不能不承认，那真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关于这一点，《中国青年报》的徐百柯兄已经在《民国那些人》中作了很好的梳理与展现。那一个个活的灵魂，一想起就让人血脉贲张、激动不已。但正如这本书的封底所言，“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

他们身处风云变幻的历史天空之下，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

秀、刘文典等在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香港学者陈万雄语）。

大师的涌现，不是偶然的。这里仍以刘文典为例，谈谈这个话题。

第一，基础扎实的学术功底。

刘文典的“看家本领”是古籍校勘，属于典型的国学领域。他的代表作是《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这两部书分别是胡适和陈寅恪作序的。胡适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但在为刘文典的这本著作作序时竟然破天荒地用了文言文，足见他对这本书学术价值的认可。而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言中则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评价何其高也！

传统国学讲究学术传承，刘文典师承何人呢？一是刘师培，一是章太炎，两人并称“二叔”，都是近代中国不可低估的风云人物。刘文典1905年进安徽公学读书，受到刘师培的重点培养。刘师培教他的方针主要是八个字：“寝馈许书，钻研萧选”，让他天天与古书作伴，一字一句从类书上去寻差异，“结果还真做成了几本札记”。数年后，刘文典到了日本，经人介绍拜在章太炎门下，听他讲解经学、小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章太炎用佛学思想研究《庄子》的方法，给了刘文典很大启发。

做学术，是需要下硬功夫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刘文典为了校勘《淮南子》，曾经在北京的白云观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生活清苦，油水全无，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还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晚年在云南大学，刘文典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一适斋”，显然是取北齐邢邵“误书思之，便是一适”的典故。

第二，视野开阔的学术路径。

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言，刘文典奠定自身学术基础的20世纪头二三十年的时间，正是中国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

的特殊时期。

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另一方面又不可阻挡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浸染。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经留过学，擅长多门外语。比如刘文典“十二万分钦佩”的陈寅恪先生，懂得十几门外语，这让只懂得三四门外语的刘文典时常自叹不如。

这一点，表现在治学门径上，就是开阔的学术视野，能让学术走得更远、更深。1919年，刘文典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提倡在进行中国古籍研究的同时，要进行比较研究，汲取西方近世科学的精华。当时的很多学者其实都有这种“中西沟通”的本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代表作之一。

第三，宽容自由的学术环境。

“百家争鸣”一直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学术环境。可惜的是，这个梦想经常被威权所扼杀、斩断，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值得欣慰的是，即便是在那样的年代，学者们依然坚持着大胆的思考、勇敢的言说、真实的记录，否则中国传统学术早就“灰飞烟灭”了。

到了民国时代，政府尽管在文化管制上颇费周折，但由于没有限制民间办报，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允许“草根声音”的存在，这就为学术的提升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空间。而蔡元培等人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提倡，更让学术研究拥有了一个健康、良性的成长环境。

正如前文所说，民国时代特别是“五四”时代，是中国学术界思想观点最为芜杂、最为多元的一个阶段，新旧并存，正误交叉。但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威权的牵制、没有无谓的干扰，让当时的学者们敢言人所不敢言、敢想人所不敢想，做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业绩，大开风气。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第四，公平独立的学术评价。

不同标准的学术评价，会给学术本身带去极大的影响。公平独

立,不为短浅的目光所局限、不为教条的要求所束缚、不为功利的目标所牵绊,才有可能让学术研究真正达到一个理想的平台。

就拿世人最为关心的院士评选来说。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举行过一次院士评选,这也是中国首次举行的院士评选。刘文典就在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之列。有学者注意到,虽然这个评选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却照单纳入“一向同情共产党”的郭沫若,“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郭沫若后来顺利当选,而刘文典却落选了,尽管他与提名人之一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

1955年,郭沫若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也曾评选过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当时明确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政治标准,一是学术标准。有学者注意到,在没有去台湾的18名“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一半人没有入选学部委员。这种“政治挂帅”的评价体系,后来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登峰造极,直接造成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型,学术研究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如今,“政治挂帅”已成历史词汇,但在我们的大学校园、科研院所里,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评价考核标准依然盛行,如从业资历、论文篇数等。

第五,狂狷自守的学术风骨。

那个时代的大师,让人至今追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往往还是极富个性的“这一个”,清高自守,孤傲狂狷,坚守着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不向世俗的力量轻易妥协。

记得百柯兄的《民国那些人》出版后,钱理群先生有过一次演讲,谈到了刘文典等人的“狂”：“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